

## 论池莉新写实小说的创作转型

张红红

(盐城市教育局,江苏盐城 224001)

**摘要:**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的创作精神在不断分化,作家们逐渐从一种“共同的话语”世界中分离出来。池莉在分化中确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实现了创作的转型。这种转型表现在三个方面:题材重心的转移、叙事模式的嬗变、女性意识的彰显。转型后的池莉走向了成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关键词:**池莉小说;创作转型;题材;叙事模式;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8)02-0039-05

池莉这个名字是伴随着《烦恼人生》、《太阳出世》、《不谈爱情》在80年代后期的出现才被熟知和广泛接受的,是这些作品非同寻常的意识倾向、文化意味及审美特征将池莉从她自己的创作历史和新写实小说创作的大背景中凸显出来,受到了大家特别的关注。盛名之下的池莉没让喜爱她的人失望,在90年代,池莉的小说创作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是惊人的。随着她创作手法的日趋成熟和她在文坛上地位的日渐巩固,她积极寻求和挖掘在创作上的突破和创新。如果将池莉90年代的作品与她80年代以《烦恼人生》为代表的一组作品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她在新写实这片沃土上积极的探索与转变。

### 一、题材重心的转移

众所周知,9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引发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人生问题。中国文坛的创作精神不断分化,文学对于社会生活发展的回应,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池莉在这个时期的题材重心,发生战略性转移。

在这之前,普通人的平凡生活,是池莉小说取材的主要着眼点。她所选择的是那种在街上一抓一大把的普通老百姓,如:陆武桥、猫子、赵胜天、印家厚等等;她选择的生活场景是极普通不过的“吉庆街”、“花楼街”、“江汉大桥”等等;小说写

的是平常生活中的:吃喝穿戴、娶妻生子、吵架斗嘴等等细碎的家长里短。比如说《太阳出世》,整部小说三万余字,写的是一对年轻夫妻从结婚前的“小混混”到赵胜天求上进“想去考成人高考”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非就是写了孩子怎么出世,他们怎么给孩子喂奶换尿布等等一系列生活琐碎。再比如《烦恼人生》用了三万字写一个现代技术工人的一天,从早上起床写到晚上睡下。小说把一个工人一天所可能去的地方都写到了,细致的笔触直达了印家厚的一举一动,“上厕所”、“挤班车”、“乘船”、“迟到”、“开会”、“募捐”……所以有人说池莉“醉心于宁静的没有变化的生活”<sup>[1]</sup>。对于波光云谲的商海人生,很长时间不曾涉笔。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屑涉笔,不敢涉笔。只因她所熟悉的城市工薪阶层,是经济转轨中起步最晚,行动最慢的一批人。她周边的环境,迟迟未给她足够的素材。于是,她的创作的“转轨”,相应地晚了一些。

从《化蛹成蝶》、《午夜起舞》、《汉口永远的浪漫》、《云破处》、《来来往往》、《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小姐你早》、《致无尽岁月》等作品可以看出,池莉的题材重心,正在发生战略性转移。与前阶段的艺术处理上有意淡化或不刻意强调背景因素(如《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烦恼人生》)不同,这些作品却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十分确定的时代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当今时代的改革开放。例

收稿日期:2008-01-02

作者简介:张红红(1968-),女,江苏盐城人,盐城教育局高级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儿童文学。

如《你以为你是谁》的背景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经济转轨;《化蛹为蝶》和《午夜起舞》、《来来往往》的背景又显然是商品大潮和市场经济所构造的特定环境。确立这样的背景,让她笔下的人物置身于我们这个时代和城乡社会的种种欲望与诱惑中。

池莉80年代“人生”系列小说倾向与强调人的现实存在的“受动性”。《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的知足能忍,随欲而安,就是典型的例证。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更倾向于接受这种受动性的制约和限制,不能充分发展自己的“自然本性”做他们所爱做的和能做的事情,但却能在受动的人生中通过自我体验去求一种心理上的顺应和平衡。他们因而时常表现出一种类似于儒家所说的“怨而不怒”的处于中和状态的性格特征。

池莉90年代的作品写的仍是世俗生活,但创作中开始注重表现人的能动性,更注重描写人在现实生存中的积极能动的生活追求,她笔下的人物一改印家厚们的知足能忍,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他们已经不能满足于印家厚们那样仅仅依靠自我体验去获得对幸福的心理感受,而是充满着饱胀的人生欲望,要现实地抓住幸福的每一个真实的瞬间,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欲望最大限度地得到满足。这些人物往往有很强的内在冲动,又常常显得野心勃勃和信心十足。他们不怕困难,勇于冒险,在金钱和美色方面都能获得现实的成功,他们因此显得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在他们身上,“怨而不怒”的中和精神已经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发扬蹈厉的棱角。《你以为你是谁》中的工人陆武桥由于生活的困境,不惜停薪留职承包居委的餐馆;《化蛹为蝶》中孤儿小丁抓住一个偶然的人生机遇,驰骋商海。《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午夜起舞》中的王建国都是机关干部,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毅然决然下海经营。所有这些人生命改变都是因为生在商品经济的社会环境中。设若没有这样的社会环境,这些人即使有再强的从商欲望;也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内在冲动。池莉90年代之后作品充分地显示了人与环境的这种依附关系。而且,在这些作品中,池莉也确实让她笔下的人物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他们各自追求的人生目标,尤其是金钱和爱情这两种幸福的标志。陆武桥不但通过承包餐馆挣得了一份可观的家业,还赢得了一个女博士的爱情;康伟业虽然在

事业成功之后的个人感情方面一再受挫,但毕竟也经历过婚姻生活的甜蜜。池莉正是通过描写这些人物的生活追求及其在事业爱情上所获得的成功,肯定了我们这个充满物质追求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世俗生活幸福的积极追求。正因为如此,池莉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充满着一种勃勃生气,笔下的生活总是充满着一种诱人的光彩。与那种在物质文明尚未发达的时代就高张反物质大旗,在人生欲望尚未来得及展开的时期就反欲望的作品相比,池莉这些作品更具有现实意义。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清楚看到池莉小说创作在题材选择上的转型:从琐碎困窘的俗世中将镜头聚焦于以经济关系为背景的生活中来,并对生活之变,个体之变及家庭爱情冲突进行挖掘。

## 二、叙事模式的嬗变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崇尚革命启蒙,热衷于营构宏大史诗,致力于对时代英雄和理想的讴歌。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新写实中坚力量的池莉连同其他“同志者”在叙事模式上对传统现实主义与先锋文学进行了反叛。他们在书写生活时采用民间对话,担当民间话语的转述者;以民间的意识去感悟、体味、咀嚼生活,让生存本身的艰难困苦浮出水面,显露人世。池莉曾说过:“许多有经验的作家们告诉我们小说就是写生活的横截面,这种教诲常伴着无数名著的出处,当然是正确的。”<sup>[2]</sup>这里说的就是传统小说创作理论中的“横截面”的理论。长久以来小说的创作便延续着这么一条路子走了下来,力争用有限的文字写生活的一个侧面,一个小片段,表现生活的深意。而池莉的小说创作走的是一条新路子。她的小说没有再写生活的一个横截面,而更像是一种流体的结构,这种结构被称为“生活流”。我们无法在《烦恼人生》《不谈爱情》等作品中找到情节的戏剧化,情节模式变成了以自然时间为序的纷繁扁平的日常生活,并且环环相扣,因果相应。而这种“生活流”的结构方式,不仅仅只是表现在小说的大时间构成形式上,更表现在小说构成故事的那种反传统的,非戏剧性的结构上。中国传统小说创作,受古典小说的影响很深,有着“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种相对固定的模式,讲究用矛盾冲突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池莉小说这种“生活流”式的结构不同。她完全不用或是避免使用那些会使小说看起来比较吃力或是根据作者

的思绪来结构或是比较陌生化的手法,比如说倒叙或是插叙,或是根据作者的思绪来结构或是打乱一个故事。也许池莉认为那是一种匠气,因为她认为“只有生活是冷阴无情的”,“我愿意像一只猎犬那样警惕地注视着生活。我反反复复做着一件事情,用汉字在稿纸上重建仿真的想象空间”<sup>[3]</sup>。池莉的小说努力依照时间的流程叙事,尽力将故事处理成粗砺鲜活的生活流。或许,也正是如此,许多普通读者才被其小说中那种几乎与真实生活完全一致的细节、人物行为、生存环境甚至那种涌动的生活流所打动。池莉还采用了近距离或无距离的视角,将一个个普通人在日益商品化的社会中的物质世界的不如意,精神世界的压抑、苦闷,纳入其小说的表现空间,将社会和人的物质和精神的零散化投影为文学的零散化的风景。她借助零度感情的后现代方式把罩在普通人头上的神圣光环驱散,还原生活的本真状态,直抵生活的内在,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相对抗,以日常自在的方式解释存在的意义。

然而,虽然池莉早期小说创作在表达人的生存问题时开拓了一条新路,可是平实的世俗价值观念和对理想的摒弃,对环境的一味退却又显然不是池莉所追求的精神品位;零度的创作状态也将使作品人物停留在表层状态,缩小表达的空间。于是,池莉选择了变通。

90年代以后的作品中,池莉在叙事形式上有所转变<sup>[4]</sup>。偶然性,戏剧性情节的大量运用使这一时期池莉小说增添了浓郁的智性色彩。小说仍然带有极强的写实特征,但又明显地区别于80年代作品。小说在局部保持生活流的情况下,更倾向于一个充满悬念的故事。在《云破处》中,池莉将故事围绕金祥和曾善美一对夫妇展开。它讲述的不再是为了生计所逼,为环境所迫,终日在物质和精神的两极空间中游移不定的小人物的故事。《云破处》讲述的是一个连环谋杀案件,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线索也比较单一,但是作者在写作中则丝毫不给人以单调平板之感。作者精于组织细节,她把男人与女人的狡辩和机智,躲避与追踪,心理与肉体的矛盾冲突聚合在一起。既在人物的行动中推动矛盾的发展,又抑制矛盾的直线上升,使矛盾和冲突渐渐进入高潮。同时,作者也巧于设置悬念。比如,为什么曾善美结婚十五年一直不能生育?为什么曾善美在聚会以后性情大变?为什么她要苦苦追索金祥的过去经历?为

什么她要揭开自己难以启齿的疮疤?为什么她要奋不顾身地激怒金祥?这一连串的悬念使故事情节一波三折,层层推进。在不断地设疑和逐步释疑过程中,读者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知后事如何的欲望,充分调动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这样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方式,明显不同于池莉以往的创作手法。在以往的作品中,池莉大多描写平民社会中的世俗生活,一般都是把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加以故事化的组合,叙写小人物生活中的小波细浪。作品虽不乏对立与冲突,也有牵动人心的情节,但几乎没有高潮,情节发展缓慢,有时情节的进程如生活本身一样零乱而无序<sup>[5]</sup>。

在叙述立场及目的指向方面,池莉90年代的作品也有所转变。其实,从《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开始,池莉已经着意于以知识分子的立场从琐碎表述转入带有哲学意味的表达,从平庸的生活的生存状态中发掘诗意。而1994年的《绿水长流》和1995年的《化蛹为蝶》,池莉更加“形而上”,一改面目地在作品中加重理性色彩的投入。如她自己所言,“我的文学将以虚幻的爱情为主题之一”。由“不谈爱情”到“拆穿爱情”,即开始了她小说创作的变更的目的性,“拆穿虚幻爱情”的进步,表明池莉已经从对消极状态的所谓真实“零度情感”的再现,走向一种对热情和理解的呼唤,走向了对作品的直接干预。《化蛹为蝶》中,尽管制作的粗糙随处可见,但她故事叙事节奏和风格已与前大相径庭,即从琐碎的生活流的呈现转入极富跳跃性的梗概叙述,她那出色的真实而琐碎的再现已经退却得一干二净,奔向那个与现实相距遥远的理性之颠,加深思辨力度。在《黑鸽子》中,庄严对马腾跃说起自己当年的恋情:“那些日子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歌德的《少年维持之烦恼》,当然,这种书现在是没人看了,太古典了,现代人谁还耐烦看它。”这里将“过去”与“现在”作对比,给人以鲜明的社会变更感。但暗示出社会没有方向的漂移感。我们可以说池莉已经在思考一些关于人生的畸变性,社会没有方向的漂移,或者,我们可以说池莉已经在思考一些关于人生的哲学问题,更趋于厚重与成熟了。

池莉的语言叙述语言也有变化。新的池莉叙事语言是一种文人气与市民气相杂的语言,文明又略显张扬。在笔力较弱时它往往会铺张得一发不可收拾,但伸缩性极强,随着笔力的纯粹,语句间会出现意蕴深厚的空间,其表现之一便是:单

字、单词、单句的表达力度甚至超过了长句、复句。在《致无尽的岁月》中,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闭上眼睛把头一摇,就可以感觉到生命的速度是飞。”结尾处又呼应道:“十几年的岁月在他和我之间倏忽地就过去了!如旷野的灰色野兔在奔跑。”池莉是在借时间的流速喟叹萌动青春的一去不回。这样的情感流泻通篇可见,使小说蒙上了一种诗韵。

### 三、女性意识的彰显

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大多数女作家几乎都是凭借表现爱情或个人感情而登上文坛,她们或是写纯洁真挚的爱情故事(如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或者展现了叛逆的思想、内心(丁玲《沙菲女士的日记》、陈染《与往事干杯》)。女作家们的笔下不是如诗如画地描写爱情,就是如梦如幻地向往着爱情,或是大胆披露女性深层的内心体验。池莉特别实在,不似惯常的爱做梦的女人,似乎也没有文学女性的梦幻时期。她一登上文坛就以凝重写实的风格,表现了艰难的生活现状里爱情被淹没,表现了活着的艰难和生命的卑微,她只谈活着而不谈爱情,淡化诗意而强调真实,她回避极其个人的内心情感的流露,而特别关注社会的人生际遇<sup>[6]</sup>。大概正是以上种种,让我们对池莉小说形成了一种误读。那就是我们忽略了池莉的女性意识在其作品中自然的潜性的显现。其实,池莉作品中女性意识正是循着缺乏诗意与爱情神话的婚姻场景中女性形象的成长以及两性关系的变更得以体现的,并通过两性关系由不平衡到平衡的温和的审视,使女性意识逐渐明晰起来。

80年代创作的小说中,池莉给笔下的女性太多的认同和过分的宽容,未做出唤醒她们的内在生命潜能和精神意识的觉醒的努力。《烦恼人生》中印家厚老婆的全部烦恼聚焦于一系列的极为现实的问题上,感情的渴求则被覆盖于现实打算之下。《太阳出世》中的李小兰因为孩子诞生感觉太阳升起,实现了从少女到母亲的角色跨越。在《你是一条河》中,作家的笔力重在表现寡妇辣辣怎样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主动顺应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性爱角色,无论与粮店老李有染,还是与医院朱老头的纠缠,还是始终拒斥无用书生小叔子的浪漫求爱,无一不是出于生存的考虑。辣辣未尝没有对于情感的渴求,但生存的艰难湮灭了一切。小说中富有意味的是,对母亲的作为最反

感的冬儿在自己做了母亲后,终于体谅了母亲。这也是一种认同,对现实的认同。同样,李小兰在经历了一次太阳出世般的更生之后,庸常世俗的日子便占据了她的全部视野和感情空间。极为狭隘地以现实利益为价值标准的满足方式,使她们停留于物质贫困精神更贫困的生存状态。正是因为作者给这样女性太多的认同和宽容,她早期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并不清晰。

90年代以后,池莉逐渐把自己的创作心态调适到与女性主义观点可衔接的位置,开始了独具个性的小说书写。池莉小说的女性意识表现在告别传统女性形象上。小说《一去永不回》把年轻女性在恋爱中的自私与果敢演绎到了极致,彻底否定了传统女性在爱情上的含蓄与羞涩。小说近乎直白地讲述着一个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女孩,爱上了与自己地位不相配的青工,在被父母阻碍后,不得不外出学习,但在精神上与家庭割裂。归来后得知青工已结婚,并没有像传统女性那样哀叹着做一名认命的怨妇,而是设计让这名青工侵犯自己,使其以强奸未遂罪入狱。在青工因此失去妻子后,她坦然地等他出狱,并嫁给了他。女主人公出现时美丽、善良、纯真,但是在经历了感情的伤害后,她立刻撕破文化的外衣显露出女性本能的冷酷与自私。而在《小姐,你早》中,池莉又把一个高级知识女性世俗的一面剥露出来:当她撞见了丈夫的外遇后,知识女性的优雅与智慧消失殆尽,她当众辱骂丈夫并抖落出他的所有缺陷,最后又与两位同样被男人伤害过的女人联手彻底制服了这个背叛她的男人,扑入读者视野的是一个由可怜可悲的角色迅速向无情报复过渡的捍卫自己尊严的女性形象。在小说《云破处》中,池莉将一个“杀夫”的故事安放在一个模范妻子身上,使我们看到一个文明而又正常的“核心家庭秩序”竟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之上——体面成功的男人是一名少年投毒杀人犯,贞洁贤淑的妻子是一个乱伦的女子。最后女主人公以女性的仇恨结束了男人的无罪恶感,无良知的生命。这是一次以撕裂彼此的身心为代价的行动,是对男性侵犯性本能的彻底批判。

池莉并不是女权意识很强的作家,但她90年代的小说中开始有了越来越浓郁的女性意识。她试图通过笔下的女性形象,去颠覆男权社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小说是《你以为你是谁》。小说的男主人公陆武桥是一个充满自信的成功男人,

在他清晰明白在理顺了事业家庭中的一切矛盾,正在为自己未来的生活绘制完美的图画时,他所挚爱的女人给了他致命一击。在从容不迫在享受了一天中国式的婚姻生活后,她平平静静地告诉陆武桥:“我们方才的一个白天和夜晚已经完了我们俩的一生。那就是我俩今后的日子,再好也好不过它们了。可我不能一辈子都这么过,我会很快厌倦的,你会很快习以为常的。”接下来作者精心地描绘了陆武桥这个“强大”的男人的倒塌:“听到这里,陆武桥如梦初醒,但身心如泥委地,只有泪水慢慢地溢出眼眶。”三天后人们找到他时,“陆武桥一个人衣着整齐地躺在床上,已经气息奄奄,不省人事。”这种对习惯主宰一切,操纵一切的“男子汉”的形象的否定在池莉九十年代以后作品中占据很大比例。作为一名女作家,池莉总是力图表现女性从根本上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展示现代女性极富目的性的行为来粉碎男人的权威。在《云破

处》、《惊世之作》、《小姐,你早》、《生活秀》等一系列作品中,池莉都用了类似的手段——先塑造一个在世俗眼里极成功的男人形象,然后再塑造一个女性,彻底地粉碎他们,并取代他们的权力,金钱和智慧。这是池莉彻底否定男权神话的创作意图,也是其他女作家不具备的勇气与气度<sup>[7]</sup>。

池莉曾说:“一个人就和一颗星辰一样,他有自己的位置。他在自己的命运里,经历着他个人的经历,他的视角,他的感觉,他的世界观,所产生的变化只能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逐渐成熟和壮大的过程。”从八十年代到近年来的创作,池莉对人生的探讨,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书写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她创作中的多方面的转变,使她的小说逐渐成熟与壮大,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我总相信好的小说是在重复中在盘旋中诞生”。这种盘旋即是她在小说转型中的种种探索。我们对她创作的下一轮“重复与盘旋”将要取得的艺术成就充满着期待和祝福。

#### 参考文献:

- [1] 西惠玲. 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23.
- [2] 许志平. “我想探寻自己的路”——访池莉[N]. 文艺报,1988-11-26(5).
- [3] 池莉. 虚幻的台阶和穿越的失落——关于小说的漫想与漫记[N]. 文艺报,1996-1-5(5).
- [4] 刘川鄂. 小市民名作家 池莉论[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142.
- [5] 王平. 池莉小说创作的新动态——读中篇小说《云破处》[J]. 长沙:中南大学学报 1998(3):65-71.
- [6] 於可训. 在升腾与坠落之间——漫谈池莉近作的人生模式[J]. 当代作家评论,1998(1):23-29.
- [7] 王家伦. 新时期女作家论[M].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4.

## On the Novelistic Transition of Chi Li in Realistic Period

ZHANG Hong-hong

(Education Bureau of Yancheng, Jiangsu Yancheng 22400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the creation spirit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world is splitting up constantly, the writers separate out from a kind of "common words" in the world gradually. Chi Li has confirmed her own creation road in splitting up, and realized the transition that is created. This kind of transition behaves in three aspects: narrating of the center of the subject matter, reflecting of the transmutation of the mode, women's consciousness of transformation, Chi Li moves to maturity after making the transition and has formed her own style.

**Keywords:** Chi Li's novel; transition of creation; subject matter; narrative mode; women's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沈爱琴,丁小玲)